

文革追忆 专集（二）

(CND-CM)

—— 增刊 第七十七期 ——  
(一九九六年二月十日出版)

1.【编读往来】	让我们携手在网络上共建一座文革博物馆	CND编辑部
2.【史海钩沉】	1966：学生打老师的革命	王友琴
3.【当年的歌】	反动学生诗选	格丘山
4.【幻想小说】	“文革博物馆”之梦	叶永烈

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、《华夏文摘》或CND的观点。

...

话说有那么一天，一支贴着蓝底白字的“航空”标笺的牛皮纸信封，从北京“飞”到上海，“飞”到我的办公桌的玻璃板上。大信封上，龙飞凤舞的毛笔字：“上海博物馆学会收”。下端，印着一行红色仿宋体大字：“中国博物馆学会”。

好啦，我忘了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下我自己——鄙人在上海博物馆学会充任秘书微职，人称“叶秘书”。收收发发，跑跑腿，张罗张罗开会之类，均属鄙人工作范围。

拆开信封，首先映入我的眼帘的是一份复印件，印的便是“ABCD”。幸好，我懂“洋文”。那是最近一期《法兰西博物馆学报》上的文章。按照学报惯例，要登载作者简介。显然，这位作者是第一次在《法兰西博物馆学报》上发表论文，所以论文之前有着用法文写成的作者简介：

BA Jin (PA Kin), né le 25 novembre 1904 à Chengdu, capitale de la province du Sichuan, est l'un des grands écrivains chinois mondialement connus.

.....

这个BA Jin显然是个中国人，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成都。不过，说实在的，我在博物馆界工作多年，不光熟悉中国博物馆界所有头面人物，而且小有名声的人士也都了若指掌，我却居然不知BA Jin其人。何况，此人绝对不可能是博物馆界的“新星”——因为他年已九旬！

不知怎么搞的，BA Jin这名字听来耳熟，像是“巴金”。不过巴金是作家，怎么可能在《法兰西博物馆学报》上发表论文——须知，学报是从来不登小说的。

等我读了那篇译成法文的论文，茅塞顿开——BA Jin，百分之百是巴金！

原来，那篇论文的标题是《“文革”博物馆》，文末注明：转载自巴金著《随想录》。

说来惭愧，还在巴黎的法国高鼻子同行译载了巴金的《随想录》，跟巴金同喝一江水的我却未拜读过这本书。我只是在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里听说过巴金建议建立“文革博物馆”的消息，听音从这支耳朵进，从那支耳朵出。不，不，这声音经过位于两耳之间的大脑时，我曾在瞬息之间迸发出过“一闪念”，因为博物馆毕竟是我的本行嘛。当时，我的直感是：“文革”能办博物馆？得了吧，“凄凄惨惨戚戚”，肯定办不成……这“念”在脑海中“一闪”而过，立即无影无踪。

我的直感并非我所独有。果真，当巴金的建议在报上发表之后，虽然有那么几个作家写文章表示支持，但是那声音只不过使空气无谓地振动了一番。没几天，巴金的建议就淹没在第十届亚运会夺金牌的喧闹声中……

白纸上的黑字，要想变成事实，难哪！怪不得作家黄宗英称自己的报告文学为

“呼吁文学”。她只能为那位植物学家徐凤翔在纸上建造一座“小木屋”。小木屋用得了几个钱？也这么难造。看来，巴金只能在纸上建造“文革”博物馆了！况且，“文革”博物馆难以建造，恐怕还不是缺乏经费——多少大厦正在华夏大地拔地而起，只要让出其中的一幢，“文革”博物馆就绰绰有余了……

哦，在巴金的建议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时候，“洋伯乐”却发现了它。那复印件的右下角，标明“1”，不言而喻，巴金的文章被登在《法兰西博物馆学报》首页！

在那“飞”来的牛皮纸信封里，还附了一封公函，盖着圆溜溜的公章，全文如下——  
上海博物馆学会：

顷接法国博物馆学会航寄的《法国博物馆学报》，译载了上海作家巴金的《“文革”博物馆》一文。现将该文影印件寄上，供参考。可否将影印件送巴金一阅，请贵会酌定。

## （二）中国博物馆学会

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的顶头上司——上海博物馆学会理事长金教授。他答覆道：“转交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，由他们定。”

例行公事。我熟练地把影印件装入一支空白的牛皮纸信封，写上：“上海巨鹿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收”。

至于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如何处置那份复印件，已全然与我无关了。

一切的一切，都办得滴溜溜圆。

几天之后，我看到报上登载的消息：“《法兰西博物馆学报》最近一期译载中国作家巴金的《“文革”博物馆》……”显而易见，那是中国作协上海分会收到我寄去的复印件后向报界透露的。

这条消息只在空气中引起小小的振动，一下子就消失了。我只收到上海一家报社转来的一封读者来信，质问道：“连《法兰西博物馆学报》都转载了巴金的文章，为什么我们中国的《博物馆学报》不予转载？”

我把读者来信转给金理事长。我注意到，他阅罢，红润的双颊泛起浅浅的冷笑，用铅笔在信上批道：“《博物馆学报》系中国博物馆学会主编。此信转北京。”

转即圆，圆才转。我根据金理事长的批示把读者来信转走之后，跨上自行车。车轮飞转。我赶紧往新建的上海美术馆，作为上海博物馆学会代表，出席揭幕仪式。就广义而言，美术馆之类也属于博物馆范畴。我徜徉在这富丽堂皇的艺术之宫，步入一楼、二楼、三楼，我沉醉在虚谷、任伯年、吴昌硕笔下的嵯峨群峰、似锦繁花里，我研究着新美术厅的高度与画幅高度的比例，捉摸着墙壁与陈列馆画面的反色差……当我的车轮飞转起来，闯入我的双瞳的是南京路上的彩伞、花裙、日本索尼录音机和瑞士表的广告。

忽然间，我仿佛觉得世界犹如飞速转动的车轮。流逝的时光，被甩得远远的，远远的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……

逝去了，逝去了，不光是二十年前的中国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，就连第十届亚运会闭幕式的《阿里郎》歌声也转瞬即逝……

时光倒退引出的“文革”恶梦。

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。一双双充满稚气的眼睛，注视着找我。

讲台上，没有一纸讲稿，可是，我却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：

“博物馆是什么？”

“博物馆是立体、形象的‘百科全书’；

“博物馆是老少咸宜的‘社会大学’；

“博物馆又是保存文物的‘科学殿堂’。

“总之，博物馆是一项重要的智力投资。博物馆兼具文化教育、收藏史料和科研基地三项职能……”

我广征博引，讲述着博物馆的历史：

“世界上第一座博物馆，是公元前二八三年埃及的亚历山大博物馆。

“在我们中国，汉代的上林苑，种植花卉瓜果三千种，可以算是最早的植物博物馆。

“我国历代的皇宫、祖庙、武库以及孔庙、鲁国的太庙，收藏大量文物，其实也是博物馆。

“古代的织室、董馆、牧苑、药朵国、莲花池、熊馆、梨园，是种种专业博物馆……”

每当我讲完一段话，就用右手的食指把我的秀郎眼镜朝上推一下，喝一口茶。

大厅里的灯光暗了下来。幻灯机射出明亮的光芒，这时，我成了幻灯片的解说员：

“我国现在有五百多座博物馆：

“中国历史博物馆、中国革命博物馆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、北京自然博物馆……”

每当我说到一种博物馆，银幕上便出现相应的彩色照片。

我从国内说到国外：

“大英博物馆、巴黎罗浮宫……”

“慕尼黑德意志科技博物馆、美国宇航博物馆、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……”

“现在，全世界的博物馆，已经超过两万座。”

“在英国，新近还建成了可以放在手提包里的微型博物馆，观众通过放大镜进行参观……”

就在听众的情绪达到高潮的时候，大厅里大放光明。我的讲座在掌声中结束。

接下去，听众变成观众，进入博物馆参观。我呢？可以舒一口气，走下讲台了。

可是，今天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事：当我刚刚讲毕，右手扶正了眼镜架子，一个女中学生高高举起手臂。

唉，她把这儿当成课堂了！

我只好让她站起来提问。她，看上去文静、秀气，一副林黛玉般瘦弱的长相，胆子倒不小，当着那么多人向我发问：“叶老师，您刚才讲了各种各样的博物馆，使我大开眼界。不过，巴金爷爷建议建立的‘文革’博物馆，您怎么没有讲？”

“‘文革’博物馆，八字还没有一撇，我没法讲。”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提问，我毫无思想准备，随口而答道。谁知我的话一出口，许许多多手臂举了起来，一个个连珠炮似的朝我质问：

“为什么不建‘文革’博物馆？就连刺绣、青铜器、瓷器都专门建立博物馆，偏偏不建‘文革’博物馆？”

“为什么不理睬巴金爷爷的建议？”

“我的名字叫‘红卫’，叫‘要武’，叫‘卫东’，叫‘永红’……可是，‘文革’的时候，我们在托儿所、幼儿园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我生下来的时候，爸爸说他正蹲‘牛棚’。到现在我还没见过‘牛棚’是什么样儿的！”

“我妈妈说我生在‘五·七干校’。我问妈妈，‘五·七干校’算是中专还是大专？你是大学毕业生，干吗还要上‘干校’？她说，你怎么那样糊涂，连‘干校’都不知道！其实，我妈妈才糊涂呢——我怎么会知道‘五·七干校’？”

“……”

七嘴八舌，把我也问糊涂了。我大声嚷嚷道：“同学们，你们甭问我——我怎

么会知道为什么不建‘文革’博物馆呢？”

我乱了方寸，出了一身虚汗。我脚底擦油，溜出了大厅。

闷头骑车回学会。

说来也怪，车轮飞转，那银闪闪的钢条在阳光下看上去像在倒转。车轮转得越快，钢条倒退也越快！

我在稀里糊涂地骑车，街道的景色迅速从身边倒退而去。

眼前的一切都在变，时间在倒流：

百货商店门口的红色横幅，那“达尔美系列化妆品展销”，忽地变成了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”；

一辆装满双鹿电冰箱的卡车从身边掠过，那电冰箱忽地变成了一个个胸前挂着黑牌的“喷气式”的“走资派”；

一位秀发垂肩的女郎迎面走来，忽然那长波浪变成了“阴阳头”；

像万花筒一般彩色缤纷的人流，忽然变成蓝、绿、灰的三色世界——蓝色工装、绿色军装、灰色中山装；

我的眼前，突然冒出两个头戴钢盔、手持铁矛的“文攻武卫战士”，对我大声喝道：“好大的胆子——‘假洋鬼子’，扒下你的西装和领带！”

我赶紧刹住自行车。车轮不转了。我这才看清，眼前站着两位头戴大盖帽、身穿橄榄服的交警，手中拿着罚款单。我的自行车，怎么驶入了机动车道？

### (三) 先在纸上建一座“文革”博物馆

我的脚还没有迈进办公室的门，就听见桌上的电话机在不住地发出嘟嘟声。

一个箭步奔进去，抓起了电话耳机，传来了北京的声音：“老古吗？”

我马上说道：“哦，大张！”

大张是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念书时的同班同学，山东大汉，姓张，人称“大张”。至于我，在皮箱上写了个“叶”字，他横着看，成了个“古”字，何况我又喜欢考古，便得了个“老古”的雅号。大张毕业后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工作，“文革”后成了中国博物馆学会秘书，我们之间函电交驰，沟通着北京与上海博物馆的信息。

“喂，老古，我这里上一件棘手的事：今天上午。我收到 I C O M 从巴黎拍来的电报，要求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合资筹办‘文革’博物馆！”

我从长途电话中听到这一信息，大吃一惊。他说的 I C O M，我知道是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u n c i l o f M u s e u m s——国际博物馆

协会，这个协会拥有一百二十个会员国，八千多会员。中国博物馆学会是该会的团体会员之一。该会归属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领导，总部设在巴黎。

“‘文革’博物馆又不是海底石油、旅游饭店，用得着‘中外合资’！”

“是呀，在中国，‘文革’博物馆都还是没影儿的事，外国人就要插一手，叫我们实在难堪。”

“国际博物馆协会怎么会想出这一招？”

“那是《法兰西博物馆学报》刊登巴金的文章引起的。他们读了巴金的文章，很感兴趣。他们的电报说，‘文革’博物馆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‘文革’博物馆不仅对中国人是绝对必要的，而且对于外国也虽非常需要的一——众多的外国人不理解中国的‘文革’，希望从中国‘文革’博物馆中真实地了解这场中国的大灾难……”

“喂，大张，你知道《法兰西博物馆学报》怎么会译载巴金的文章？”

“这个，这个，我想原因是很明白的——巴金年轻时去过法国，他的《灭亡》就是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公寓的五层楼上写成的。巴金的小说大量被译成法文出版。法国总统访问上海，也要去拜见巴金。巴金在法国的影响，不比他在中国的影响小。所以，《法兰西博物馆学报》译载巴金的《“文革”博物馆》一文，可以说是很正常、很容易理解的事。老古，你说对吗？”

“大张，前几天，我给你转去一封读者来信，要求《中国博物馆学报》转载巴金的文章，你收到了吗？”

“收到了，收到了，我转给了《中国博物馆学报》编辑部。据主编说，巴金的《“文革”博物馆》只是一篇散文，一篇杂文。《中国博物馆学报》作为中国博物馆界最高学报，转载一篇杂文，会有损与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。”

“《法兰西博物馆学报》呢？它是法国博物馆界的最高学报，它就不考虑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？”

“国情不同嘛！美国的报纸可以刊登批评美国总统列根的文章……唉，不说这些了，在长途电话里不必去讨论这些问题。不过，《法兰西博物馆学报》引起的连锁反应，是很清楚的——它刚一出版，I C O M就注意了，《国际博物馆学报》用英文译载巴金的文章。这下子，就连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也注意起巴金的文章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愿意为中国建造‘文革’博物馆提供资助。他们请I C O M出面，打电报给中国博物馆学会……”

“你们的意见怎样？”

“刚才，我请示了郑老……”

大张所说的郑老，是中国博物馆学会的理事长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，也是我和大张的导师。我们向来非常敬重这位博物馆学界的泰斗。我赶紧问：“郑老的意见怎么样？”

“郑老说，作为个人，他双手赞成巴金的建议。如果‘文革’博物馆一旦建立，他立即无偿捐赠三件文物——三份遗书！郑老的父亲，在‘文革’中被作为‘反动学术权威’斗死；郑老的夫人因写过称赞历史剧《海瑞罢官》的文章被打成‘吴晗死党’而迫害致死；郑老的儿子因‘替父母翻案’被打成‘现行反革命’，自绝于狱中……但是，郑老说，中国博物馆学会毕竟只是学术机构，只能为‘文革’博物馆的建馆筹备工作出点力，做个参谋，在确定馆址、建馆方案、征集和鉴定‘文革’文物方面提供学术性意见。要不要建立‘文革’博物馆，那不是小小的中国博物馆学会所能决定的，必须逐级向上请示……”

“起码得盖二十个到三十个圆溜溜的大印！”

“你太乐观了——恐怕绝对不会少于五十个大印！郑老要你我当他的左右手：请示手续在北京办理，由我负责去跑腿，来一场‘盖章马拉松长跑’；你呢，你在上海成立一个‘文革’博物馆设计方案征集委员会，先在纸上建造一座‘文革’博物馆！”

真是“英雄所见略同”，连郑老也说出黄宗英般的语言。我追问了一句：“大张，这个‘设计方案征集委员会’干吗不在北京成立呢？”

“巴金在上海！你一边征集设计方案，一边可以随时征求巴老的意见。郑老的意见是这个‘委员会’可用上海博物馆学会理事原班人马，你仍当秘书。对外用‘设计方案征集委员会’名义，比博物馆学会方便得多。郑老要你马上跟金教授商量一下。金教授是上海博物馆学会理事长，理所当然，也就是‘设计方案征集委员会’的主任委员。另外，郑老说，能否聘请巴金当这个委员会的顾问？”

长途电话打了半个小时，总算结束了。好在公事公办，我用不着担心花多少电话费。

忽然，我看见那张印着“罚款五角，不得报销”的小纸头，顺手把它揉成一团，扔进了废纸篓。

#### （四）四员大将把我紧紧包围

我，正式就任“‘文革’博物馆设计方案征集委员会”秘书。

我遵照郑老的意思，给中国作协上海分会打了个电话，请他们转告巴金，能否担任这个“委员会”的顾问？

不久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转达了巴金的话，并没有正面答覆是否出任顾问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请你们仔细读一读我的文章！”

我赶紧细读巴金的《“文革”博物馆》——虽然我曾在《法兰西博物馆学报》上读过一遍，这一回找来中文原版连读三遍，慢慢悟出巴金文章的深邃的含义和超越时代的目光：

“前些时候我在《随想录》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，我说‘最好建立一个“文革”博物馆’。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，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，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这是应当做的事情，建立‘文革’博物馆，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。



“我只说了一句话，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。我相信那许多在‘文革’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。各人有各人的经验。但是没有人会把‘牛棚’描绘成‘天堂’，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‘无产阶级的大革命’。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，绝不让我们的国家再发生一次‘文革’，因为第二次的灾难，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……”

巴金先生说，他本来相信：“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，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。”

其实，我在读他的这篇文章时，也这么相信着。

善良的“相信”，毕竟无济于事。巴老的可贵，在于直言不讳。

巴金写道：“要产生第二次‘文革’，并不是没有土壤，没有气候，正相反，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，上面讲的‘不到一个月’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，譬如说再翻一番，或者再翻两番，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，因为靠‘文革’获利的大有人在……”

巴老鞭辟入里的见解，震撼着每一个读者善良的心：谁说“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”！

我捉摸着巴金的文章，觉得他对“文革”博物馆已有了宏观的设想：

“建立‘文革’博物馆，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，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、世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。‘不让历史重演’，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。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，记得清清楚楚，最好是建立一座‘文革’博物馆，用具体、实在的东西，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，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！”

我想，我们的“‘文革’博物馆设计方案征集委员会”就是把巴金的这一“总体设想”化为“具体、实在”的设计方案。

醒，毫无睡意。

忽地，床头柜上的电话机，发出嘟嘟声。

“小叶，还没睡？”

“喔，郑老，您还没睡？”一听耳机里传出熟悉的导师的声音，我马上知道是郑老从北京打来的。

“我刚刚把巴金的《“文革”博物馆》又看了一遍。”

“真巧，‘同步效应’，我刚才也在读《“文革”博物馆》！”

“太好了，应该说是‘同心效应’——你我都在为筹建‘文革’博物馆出力。我在深夜给你挂电话，我想跟你商量，能不能以你们的委员会名义，在报纸上刊登《‘文革’博物馆设计方案征集启事》？一方面广泛征集各方意见，一方面造造舆论。”

“好，好主意。我马上照办！”

“我们先在纸上好好设计出一座‘文革’博物馆，这是第一步。不管怎么样，这第一步总是能够办到的。好吧，夜深了，不多说了。祝你做个好梦！”

电话挂断了。

郑老的话，使我的脑神经兴奋起来。“我们先在纸上好好设计出一座‘文革’博物馆”，郑老的话音不断在我的耳边回响。

我久久地难以入眠。直到凌晨。音片钟发出三声叮咚，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……

我的书桌上的一张白纸，越变越大，比桌面还大，比房间还大，比篮球场还大，比天安门广场还大……

我的双脚踏上了白纸，顿时，头上一碧如洗的晴空骤起风霜，重云如盖，密密匝匝地涌入苍穹，朔风飕飕，卷地而来。我打了个寒噤。

猛然间，飘飘洒洒，竟下起大雪来。唐诗云：“燕山雪花大如席。”那雪花，真的犹如凉席一般大。不过，细细一瞧，那雪花很脏，白里夹黑。

漫天飞舞的雪花，竟在白纸上堆积成一座硕大无朋的雪屋。

我朝雪屋走去。近了，近了，我看清楚了。那铺天盖地的“雪花”，原来是数不胜数的大字报！

我的神经顿时像二胡的弦，绷紧了。触目惊心的标题：

“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——刘少奇！”

“打倒彭、罗、陆、杨！”

“打倒‘三家村’黑店的掌柜——邓拓！”

“打倒文艺黑线头目周扬！”

没完没了的“打倒”。其中，也有好多张大字报上写着：“打倒巴金！”

我吓得丧魂落魄，连连倒退。

忽地，一员秃顶大将，瞪着一只金鱼眼，抡着一根金棍子，朝我劈头盖脑打来。我赶紧闪，这才棍下逃命。此人颇为面熟。我想了一下，哦，记起来了，姚文元也！

我见逃路被姚文元堵住，只好朝前走去。

“呔！”一彪人马拦住去路，个个头载藤帽，手持铁矛，身穿劳动布工装，肩

挂“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”红袖章。为首的大将双眉倒竖，把铁矛笔直朝我刺来，不言而喻，此人乃“司令”王洪文。

我赶紧往左边逃去，一个手持鹅毛扇的人物挡住了我。此人的打扮像诸葛亮，可是戴副眼镜，目露凶光。身后的大旗上写着五个大字：“狗头军师张”。他把手中鹅毛扇轻轻一扇，一股阴森森的刺骨寒风钻心透髓，我差一点摔倒在地。

我踉踉跄跄地朝左边滑脚。不料，一个戴眼镜的白骨精对我尖声大喝：“你往哪里逃！”我一眼就认出，她是江青。她的手中提着一盏红灯，热辣的光芒差点把我烧焦。

这四员大将前后左右收紧包围圈，我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处于金棍、铁矛、寒风、热光的团团围困之中。

这时，语录歌、“牛鬼”歌、红卫兵战歌以及“滚滚滚，滚他妈的蛋”之类造反歌从许许多多高音喇叭中传出，差一点震破我的耳膜……

我出了一身冷汗，双腿哆嗦着。包围圈越收越紧，那四员大将离我只有一箭之遥。

姚文元对我大声呵斥道：“休得胡来！你筹建什么‘文革’博物馆。你要知道，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谁就是反革命！”

王洪文对我翻了翻白眼说：“你知不知道《公安六条》？我们工人阶级是不好惹的！”

张春桥阴阳怪气地道：“我向来是个秋后算账派！我的账是记得一清二楚的！”

江青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气，教训我道：“现在的文化大革命，仅仅是第一次，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。每隔七八年、十来年要进行一次。你否定文化大革命，你是右派翻天。等着吧，下一次文化大革命，第一批的炮打目标，就是你这种漏网右派、漏网现行反革命反子！”

江青说毕，手中高高举起红灯，顿时一道炫目灼热的红光朝我直射而来……

我睁开眼睛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一轮火球冉冉升上蓝天，那流金烁烁的光芒透过窗口直射到我的眠床之上。

我一个鲤鱼打挺，从床上跃起。我发觉床边的书桌上，那张白纸依旧雪白……

#### (五) 五花八门的“文革”博物馆设计方案

又是漫天大雪。

这一回，从天而降的不是那杀气腾腾的大字报，却是一封又一封关于“文革”博物馆建馆的建议书。

郑老不愧为“智多星”。他的主意——刊登《“文革”博物馆设计方案征集启事》，打破了以往筹建博物馆的程序，把“文革”博物馆的筹建工作推向社会，牵动了亿万颗赤诚的心。

我忙得连做梦的时间都没有了——每天，邮递员都送来一大袋信件。我得一封封拆看，登记，分类。电话铃声响个不停。不断有人来访，向我面谈关于“文革”博物馆的设计方案……

说实在的，如此热火朝天的场面，对上海博物馆学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。我的办公室本来跟那些青铜器、陶器陈列室一样安静冷清，如今，我腾出了所有的文件柜，还装不下各地寄来的有关“文革”博物馆的信件。用一句眼下时髦的话来形容——“爆满”啦！

就在我忙得北斗朝南的时候，讨厌的电话机又响了。我拿起了耳机，耳边响起的是郑老的声音：“小叶吗？你马上坐飞机来北京！”

“有什么要紧事？”

“刚刚收到 I C O M 来信，说是要派一个考察小组到北京，考察中国的‘文革’博物馆筹建情况，同时商谈合资建造‘文革’博物馆事宜。”

“你同意他们来考察？”

“干吗不同意？人家有这样的积极性，难得！我们理所当然——欢迎！”

“可是，各地寄来的设计方案五花八门，现在拿不出一个统一的、完整的方案……”

“可贵的就在于五花八门！你把有代表性的方案带来，把五花八门的‘五行阵’、‘八门阵’都带来，向中国博物馆学会作一次详细的汇报，请专家们进行评定、论证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，我马上飞北京！”

我的那只鼓鼓囊囊的皮箱，幸亏装有小轮。我拖着它，在水磨石走廊上前进，来到郑老的办公室。

“嗨，带来‘百宝箱’！”郑老笑呵呵地向我伸出了手，紧紧护着。

鬓须皆白，前额深沟浅槽，郑老垂垂老矣，而爽朗、风趣依旧。他的左额角，有一块明显的疤，那是“文革”的“纪念戳”——皮鞭留下的痕迹。理发师曾把他的头发朝前梳，以遮去那醒目的疤。他却要把白发朝后梳，把那“纪念戳”暴露无遗。

他的头发一丝不乱，他的办公室一尘不染。我把皮箱平放在锃亮的铺着玻璃板的条几上，箱子里装满各种笔迹的设计方案和建议信。

我跟郑老隔着条几，对面而坐。在向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会作正式汇报之前，我先向理事长郑老汇报，以便听取郑老的意见。

“郑老，很抱歉，我匆匆赶来没有时间写出书面汇报，只能随口而讲……”

像聊天一般，在轻松的气氛之中，我向郑老作了汇报：

“郑老，来信真多。从报上登了启事那天算起，到我离开上海为止，才二十三天工夫，已经收到二万九千八百七十二封来信。接待来访者三百六十七人，电话五百七十四次。

“来信最多的是两种人——深受‘文革’苦难的上了年纪的人和不知道什么是‘文革’的年轻人。前一种人希望下一代牢记‘文革’惨祸的沉痛教训，后一种人希望不要再遭‘文革’劫难。

“来信也分两种——一种是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，另一种是设计了‘文革’博物馆的具体方案。

“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来信，都赞成巴金的提议。许多人提出了补充性建议：建立‘文革学’，建立‘文革研究会’，出版定期刊物《文革研究》，建立‘文革档案馆’……

“也有九封匿名信，痛骂巴金……”

这时，郑老马上说：“给我看看！”

郑老的脸色变得非常严肃，他用手把垂下来的头发朝后一掠，朗读着一封封匿名信。

读罢，他的太阳穴的青筋平复之后，我才慢慢讲述各种方案：

“第一，设馆宗旨——一致赞同以巴金的《“文革”博物馆》一文为宗旨。一切‘文革’博物馆的设计方案，都只不过是把巴金的建议具体化。

“第二，馆址——所有的设计者都认为应设馆于北京。有人建议应在上海建立分馆，因为上海曾经是‘四人帮’惨淡经营多年的基地。也有人建议，各省、市，凡有条件的地方，都可以设立分馆。

“《天安门革命诗文选》一书的编者—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‘童怀周’建议，馆址应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，因为那里是‘四五’运动的发祥地，而且是北京市中心。不过，‘童怀周’没有具体说明建在天安门广场什么地方。据我所知，天安门广场北有天安门城楼，南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，东有历史博物馆，西有人民大会堂，已经没有空余的地方。

“第二，馆色——分红、黑、白三种意见。

“主张会馆红色的，是因为‘文革是红海洋’；

“主张会馆黑色的，是因为‘文革是大灾大难’；

“主张会馆白色的，是为了‘悼念浩劫中的死难者’。”

“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设计者都经过了认真的思索……”郑老看着设计图上的红房子、黑房子、白房子，嘴角漾起了笑纹。

“其实，这样的各种设计，例子不少哩。”我已无法按照在飞机上事先打好的腹稿逐条而讲，真的变成了随口而说了：

“关于‘文革’博物馆入口处的设计，也有三种方案——

“第一种主张，在入口处立一块巨大的大理石，用金字刻上巴金的一段话——只有牢牢记住‘文革’的人才能制止历史重演，阻止‘文革’的再来建立‘文革’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，惟有不忘‘过去’，才能作‘未来’的主人。

“第二种主张，在石碑上刻着：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——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，中国历史上的空前浩劫。

“第三种主张，是一位雕刻家提出来的，他愿用黑色的大理石，雕刻十六颗头像，钉在入口处的历史的耻辱柱上。他雕刻的是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——林彪、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、陈伯达、谢富治、叶群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、林立果、周宇驰、江腾蛟。”

“有意思，有意思。”郑老不由得抚掌称好。笑罢，又问道：“关于‘文革’博物馆的主体设计，有哪些方案？”

“方案可多啦。”我答道，“大体上分为两类——

“第一类主张以时间为纵线，按照‘文革’的三个阶段，揭示‘文革’的灾难。也就是从一九六六年的《五·一六通知》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‘九大’；从‘九大’到一九七三年十月的党的‘十大’；从‘十大’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‘四人帮’；

“第二类主张从横的方面加以归纳。

“有的认为，应分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两大部分，展出他们的罪行录；

“也有的认为，应分为几个分馆，分别揭露‘文革’乱国、乱党、乱军、破坏工农业生产、迫害革命干部、迫害知识分子、贻害青少年等等。”

汇报到这里，我从皮箱里拿出一大迭信，对郑老说：

“这是一批特殊的来信，每一封信，都曾使我感动不已。

“这是一位在‘文革’中坐了十年牢的老干部写来的信，他愿把所有补发的工资献给‘文革’博物馆，作为建馆经费；

“这是一位集邮迷的信，寄来了全套‘文革’邮票。他说，仅管现在‘文革’邮票在海外价格昂贵，他却无赏献给‘文革’博物馆，让人们看一看，‘大革文化命’之时连邮票也变得僵化，成了变相的标语牌！

“这是一位寡妇的来信。她说，她的丈夫在‘四五运动’中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。丈夫死于‘四人帮’的乱棍之下。她愿把这些用亲人的生命换来的照片，献给‘文革’博物馆。”

“这是参加最高人民法院‘四人帮’的一位法官的来信，认为筹备‘文革’博物馆时务必搜集以下大冤案的材料：内蒙古的‘内人党冤案’，受诬陷迫害达三十四点六万人，被迫害致死的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；云南的‘赵健民特务冤案’，被迫害致死的达一万四千人；河北的‘冀东冤案’，受诬陷迫害的八点四万人，其中含冤屈死的为二千九百五十五人。”

“这是一位历史学家的来信，建议实行‘三位一体’，即把‘文革’博物馆、‘文革’研究所、‘文革’档案馆一起筹建……”

“有意思，有意思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郑老读着这些来信，眉飞色舞，兴奋之情难以自制。

这时，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，问郑老道：“您作为中国博物馆学会的理事长，能不能谈谈您的设计方案？”

“我的设计方案，是一个梦！”

“梦？”

“是的，那天晚上，我给你打了长途电话之后，忽然，夜里做起梦来了。”

“那天夜里，我也做了一个梦。”

“太巧了，太巧了。我在梦中，参观了我自己设计的‘文革’博物馆……”

在我的再三请求之下，郑老把头发朝后一掠，说起了他的梦：

“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白纸。突然，白纸变得很大很大，比桌面大，比房间大，比篮球场大。哦，变成了天安门广场！”

#### (六) 举世无双的“灵魂博物馆”

“我徜徉在天安门广场，我决计把‘文革’博物馆建造在这里。我环顾四周，虽然东、南、西、北都拥立着庞大的建筑物，我却找到了建造‘文革’博物馆无比宽广的地方——地下！”

“对，天安门广场下面，是一片空白，可以用来建造‘文革’博物馆。何况，这样的博物馆，也只有建在地下最合适。走进这个博物馆，观众如同步入‘地狱’！”

“我在纸上画好设计图。我一挥手，天安门广场之下，就建成了一座博物馆。”

“地道的入口处，竖立着一块巨大的黑牌，上面刻着一行白字——也就是一九

六六年六月二日《人民日报》社论的标题——‘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’。

“长长的地道，四壁不是全红、全黑、全白，而是有红、有黑、有白。四壁贴满各种各样的大字报，白纸上写着黑字，打着红叉，所以有红、有黑、有白。不光地道如此，所有展览厅的四壁，全部糊着大字报。大字报是‘文革式贴墙纸’，最能体现‘文革’的‘时代风貌’。

“我设计的‘文革’博物馆，实际上是举世无双的灵魂博物馆！

“‘文革’的许许多多口号都是错误的，而我以为唯有‘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’这句话是正确的。‘文革’，使每一个人都充分表演了一番，淋漓尽致地显示了自己的灵魂！

“灵魂，向来被视为是寓于人体之中而又主宰人体的非物质。通常，灵魂是不可见的，是无形的。然而，‘文革’是灵魂的显影剂，使灵魂变得可见、有形。正因为这，我把灵魂作为‘文革’博物馆中最重要的展品。

“按照灵魂形状的不同，把‘文革’博物馆分为三个展览厅。

“第一个展览厅，展出方形灵魂。方形灵魂像砚台。尽管被黑墨横涂直抹了不知多少遍，它依然是方方正正的！

“在第一展览厅里，陈列着陈毅元帅的灵魂、贺龙元帅的灵魂、彭德怀元帅的灵魂、邓拓的灵魂、老舍的灵魂、傅雷的灵魂、张志新的灵魂……他们方方正正的灵魂，永垂史册！

“在第二展览厅里，展出三角形的灵魂。三角形的灵魂善于钻营，既可作为伤人暗箭的箭头，也可作为‘反戈一击’的矛头。

“不言而喻，林彪、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，他们的灵魂都成了第二展览厅的展品。当然，还有聂元梓的灵魂、戚本禹的灵魂、徐景贤的灵魂、王维国的灵魂、陈励耘的灵魂、游雪涛的灵魂……他们的灵魂全是三角形的，只是顶角的角度稍有不同，有的更尖些。有的夹角大一点。这些三角形的灵魂，像吃人虎牙，像疟蚊的尖喙，像巫婆的长舌，像带血的刺刀！

“第三展览厅，展出圆形灵魂。圆形灵魂无棱无角。其实，圆形灵魂原先并不一定无棱无角，可能曾方方正正，也可能曾有过三角形，正如鹅卵石原先并非圆溜溜的一样。激流的冲刺，磨去了这些灵魂的棱棱角角，变得圆滑起来。圆形灵魂无害人之刺，却也无抗争之力。

“我的灵魂，应当放入第三展览厅，成为那里的展品。虽然我的家中，三条人命死于‘文革’，可是我自惭没有像张志新那样成为反‘四人帮’的勇士！在‘文革’中，像我这样的圆形灵魂可以说是最多的。

“从第三展览厅里出来，便走向出口处。

“我在出口处竖立一块巨大的‘照魂镜’。这镜子没有耀眼的银光，是由棍子、皮鞭、诬告信、投井下石之石、手铐以及‘走资派’、‘现行反革命’、‘三反分子’之类帽子所组成。在这凶光毕露的镜子之前，能照出每一个未曾尝过‘文革’



‘滋味的人的灵魂——究竟是方形、三角形还是圆形？’

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郑老，您的梦是一个高超卓越的设计方案。”我连忙说道，“不过，我有一点小小的补充——还有一种灵魂，是无定形的！如果要找一个无定形的灵魂作为展品，我可以算一个。郑老，我是您的学生。在‘文革’开始的时候，我保过您，曾成为您的‘铁杆老保’；后来，您被打入‘牛棚’，我也‘造反’了；曾写过批判您的大字报；不久，我又被作为‘侵造反’的‘修正主义苗子’，揪了出来。我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，成了‘逍遥派’……我的灵魂是无定形的，一受到压力就会变形，就会顺着压力变形！”

“好，好，应当再开辟一个灵魂展览厅——第四厅。”郑老呵呵笑着。

“郑老，你在梦中得到设计‘文革’博物馆的灵感，真是‘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’。”

“我的设计方案，太‘浪漫’了点。不过，我想，在天安门广场地下兴建‘文革’博物馆，这一点是可取的。当然，兴建地下建筑，经费就更大了，恐怕也就更难变为现实，只能在纸上设计设计而已！”

郑老神情黯然，仰天长叹一声。

惆怅的情绪也涌上了我的心头，我们俩望着皮箱里塞得满满的各类设计方案和建议书，久久地沉默着。

(七) 苦恼人的笑！

走廊尽头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，打破了沉默。

脚步越来越近。最后，停在郑老办公室门口。响起了敲门声。

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张！他，个高、手大、脚大，大张步入中年，发福了，显得更“大”了。

匆匆的脚步声，意味着大张有急事向郑老请示。果真，一边喊我“老古”，跟我握手，一边把一份英文电报交给郑老。

“好哇，国际博物馆协会的代表团马上要来北京！”郑老看了一下电报，说道。

“他们来了，怎么接待？‘文革’博物馆连影子都没有呢！”大张依然显示着他年轻时就很突出的急性子。

“不必担心，不必担心。”郑老指了指面前的皮箱说，“这是小叶从上海带来的，一张张设计图，象征着一座座纸上博物馆。你和小叶突击一下，把这些设计图挂起来，办一个‘文革’博物馆设计方案展览会，外宾来了，就让他们参观展览会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
大张和我都觉得郑老的主意不错。

大张略加思索，又焦急地问：“郑老，如果 I C O M 提出要给我们援助，怎么办？”

“一个傻瓜提出来的问题，十个聪明人也难以回答！”郑老发出幽默的笑声，“人家愿意给我们提供援助，真是求之不得呀！多多益善！多多益善！”

“郑老，用外资建设‘文革’博物馆，说起来不好听吧？”大张显得顾虑重重。

“怕什么？‘文革’博物馆不是赢利机构。建成后，我主张不收门票，任人参观。外国人愿为这样无利可图的博物馆提供建设资金，正是说明‘文革’博物馆非建不可——连外国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博物馆，是中国的‘特产’，是中国的‘国宝’。我们的大熊猫遭灾的时候，全世界向我们提供援助资金，我们照单全收——这有什么‘说起来不好听’？这说明大熊猫在全世界人民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！I C O M 愿向中国提供造‘文革’博物馆的经费，正是说明这个博物馆在 I C O M 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。再说，我也正想弄到点外汇，向国外购买‘文革’资料呢！”

“向国外购买？”大张和我都感到惊讶。

“有好多事情，就这么奇奇怪怪——我想，‘文革’中各种红卫兵小报、造反派小报、传单、布告、通令，是很重要的资料，应当成为‘文革’博物馆的展品，或者作为‘文革’资料馆的资料。听说国内有一个单位里收存了全国的‘文革’小报、传单。我拿着中国博物馆学会的介绍信去了，连门都不让我进——据说这些资料是‘保密’的，是‘档案’！除了公安部门和组织部门在清查‘三种人’的时候可以凭党组织专门的外调介绍信查阅之外，其余的一律不得查阅。可是，我在访问美国的时候，在他们的图书馆里看到一百多卷《中国“文革”资料集》，开架陈列，什么清华大学的《井冈山》小报，北京大学的《新北大》小报，上海的《工人造反报》、《红卫战报》，一张都不缺！这套书是美国一家出版社出版的，有钱就可以买，什么介绍信都不要。我想，如果国际博物馆协会真向我们提供资助，我要办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向美国买一套《中国“文革”资料集》！”

说到这里，郑老笑了，而这笑里饱含辛酸。他长叹道：“如今，我们要向美国购买中国的‘土产’！”

大张也笑了——苦恼人的笑！他听说我的工作汇报已经结束，便向郑老汇报他的“证章马拉松长跑”的进度：

“这是一场越野障碍长跑！在盖第一个公章的时候，我遇到了麻烦。那个手里拿着公章的人，斜了我一眼，说：你们要兴建‘文革’博物馆，不就是要揭露我们的阴暗面吗？”

“我实在无言以答。因为跟这种人没有什么可谈的。不过，第二天我又去了，幸亏那个人开会去了。另一个管公章的稀里糊涂，盖上了红色大印。

“在盖第五个公章的时候，我又遇到了麻烦。那个手持公章的人，用‘左’眼看了看申请建造‘文革’博物馆的报告，又用‘左’眼朝我一瞪。他一句话也不说，把报告退给了我。

“老经验，第二天我又去了。我以为那人也许开会去了。不料。他那‘左’眼已朝我扫来。这一回，他说了一句话：‘你怎么又来了？’我赶紧溜走。

“第三天，第四天，第五天，我每一次去，都从门缝里看见，他在掌印。我不敢进屋。一直到第六天，他出差了，另一个人在掌印。那人马马虎虎，盖上了大印。

“在盖第十个公章的时候，遇到新的麻烦。

“这一回，那个手持公章的人，上了年纪，态度挺和蔼。他看了申请报告，问我道：你们为什么要建造‘文革’博物馆？

“我用巴金的话回答他：为了防止产生第二次‘文革’！

“他听了，抽一口烟，呷一口茶，慢条斯理地说，我也天天在担心发生第二次‘文革’。

“我一听，挺高兴。他的话，跟巴金的话很相近，我们有着‘共同语言’，好办！不料，他一直抽着烟，喝着茶，就是不盖章。

“我耐不住了。说道：既然您天天在担心发生第二次‘文革’，那就请您支持建造‘文革’博物馆吧！

“想不到，他哈哈大笑起来：正因为担心发生第二次‘文革’，所以我才不能盖章！

“我莫名其妙，只得冒昧地问道：‘为什么？’

“这时，他收起了笑容，满脸严肃地对我说：我深刻地接受了第一次‘文革’的教训。现在，我每办一件事，都要想一想，如果发生了第二次‘文革’，我这样办会不会挨整！如果我在你的申请报告上盖章，第二次‘文革’来了，岂不成为我的一大罪状！同志，‘文革’的教训是深刻的，每个人都该从自己在‘文革’中的遭遇吸取永恒的教训！”

大张说到这里，久久地沉默着。郑老和我也陷入了沉思。半晌，大张才继续说下去：

“第二天，第三天，第四天……我天天都上那里，天天看见那人在办公室里一枝烟、一杯茶、一张报纸，抽着，喝着，看着。

“我向旁人打听，据说那人因‘文革’中被打断腿骨，所以几乎不出差。可他除了瘸腿之外，倒也没有别的毛病，几乎不请假。论年纪，离退休还有五年……

“现在，我就卡在这第十颗公章上。唉，还有四十多颗公章未盖呢。天哪，我的‘马拉松’。不知要跑到何年何月。我的腿都跑细了……”

我们仨久久地互相凝视，相对无言。

大张慢慢捋起自己的裤脚管，露出鹭鸶般又细又长的双腿，猛然间，我们仨都

忍俊不禁，同时爆发出一阵哄笑——苦恼人的笑！

□ 原载《争鸣》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号  
舒胜强 输入

---

Now go to [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](#)  
or go back to [the TOC of this issue](#)  
or go to [the next Zeng Kan issue](#)  
or go to [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](#)  
or go to [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](#)

---

本期责任编辑： 吴 放（美 国） <cnd-cm@cnd.org>  
本期 校对： 余子坚（美 国） <cnd-cm@cnd.org>  
读者技术咨询： 熊 波（美 国） <cnd-help@cnd.org>  
网络技术支持： 温 冰（加拿大） <cnd-info@cnd.org>  
《华夏文摘》主编： 萧 同（美 国） <cnd-cord@cnd.org>  
《CND》总编： 温 冰（加拿大） <cnd-manager@cnd.org>

---

订阅（或停订）《华夏文摘》请寄： LISTSERV@UGA.UGA.EDU（GB版）

并请注明： SUB （或 SIGNOFF）CCMAN-L FIRST LASTname

或寄： LISTSERV@BROWNV.M.BROWN.EDU（HZ版）

并请注明： SUB （或 SIGNOFF）CNDBRU-L FIRST LASTname

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

---

其他获取或阅读《华夏文摘》的途径：

无记名文件存取（FTP）：ftp.cnd.org[132.249.229.100]：pub/hxwz

（加拿大读者可用：canada.cnd.org[142.132.12.100]：pub/cnd/hxwz）

考访服务站（Gopher）：cnd.org（中文或英文目录）

万维网服务站（WWW）：http://www.cnd.org/

---

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-8602

---

本期编辑用软件： XLBR2.0 ©严永欣 NJSTAR ©倪鸿波  
GBLIST ©陈公权

本刊同时采用 ZWDOS ©魏亚桂 中文软件处理日常编务

---

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XT